

貴州社科通訊

• GUIZHOU SHEKE TONGXUN •

貴社科聯全建榮

88 / 8

贵州社科通讯

1988年第8期

(总第104期)

目 录

主 编 郭 青

1988年8月

贵州经济研究

- 贵州九年经济增长速度剖析……………谭忠信(1)
加速贵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断想……………乔学珩(6)

文 化 研 究

黔中文化简论

- 兼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贵州文化……………全建华(8)
论文化市场管理……………姜钟秀(19)

贵州外贸体制

- 我省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和趋向……………欧阳源(22)

民 主 政 治

- 我国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柳成森 尹彦(25)
浅谈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蒋先光(30)

妇 女 研 究

- 提高妇女素质是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姜琦(34)

本 刊 专 访

一支崛起的理论新军

- 访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本刊记者 刘宗严(37)

情 况 与 建 议

- 琐谈村级干部素质……………周厚坤(39)
发展农村“能人效应”初探……………李廷贵(43)

学 术 活 动

为推动社科事业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 省社科联祝贺贵阳市社科联成立的贺信……………(45)

我省社会科学战线又添理论新军

- 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46)

理论与现实的思考

- 省哲学学会学术讨论会综述……………(47)

- 照片……………(封四)

封面设计 石俊生

封面题字 冯济泉

G127.73

2-3

贵州九年经济增长速度剖析

谭忠信

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的贵州，把经济增长速度搞快一些是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速度问题不可不讲，但不顾自己的条件，盲目攀比速度，也不应当继续鼓励、提倡。那种以为把速度指标订高一点才能鼓舞人心，把速度高低作为政绩大小的传统观念应当加以改变。本文从分析我省最近九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出发，用事实验证一下我们过去的设想和期望值的合理性，有助于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进一步端正指导思想，提出更切合贵州实际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和奋斗目标。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省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效益提高，人民生活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从经济增长速度看，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八年翻了一番，工农业总产值也接近翻一番。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我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全省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辛勤劳动、共同奋斗的结果。据统计部门的资料，几个经济总量指标翻番情况如下：

社会总产值：1986年比1978年增长103.06%。1987年达到272亿元（现价，下同），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121.3%，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2%，比1953—1978年26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3个百分点。

国民收入：1986年比1978年增长

106.1%。1987年达到13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123.6%，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35%，比1953—1978年26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4.74个百分点。

国民生产总值：1986年比1978年增长108%。1987年达到157亿元，比1978年增长126.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5%。

工农业总产值：1986年比1978年增长97.6%。1987年达到218.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117.7%，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比1953—1978年26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3个百分点。

上述四个指标，以1978年为基数，除工农业总产值差2.4个百分点外，其余三个指标都在1986年翻了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四个指标都在1987年翻了一番。（社会总产值增长109.4%，国民收入增长104.5%，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6.5%，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05.2%。为什么以1978年为基数是八年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是七年翻一番？是不是我省后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个加速度呢？不是。在这九年之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最高的是1982—1984年，这三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6.6%，近三年的增长速度没有那么高，1985年是8.5%，1986年是7.8%，1987年是10.1%。主要原因是1980年基数较低。工农业总产值1980年仅比1978年增长6.12%，基本上是1979年的水平（实际比1979年还差0.04%）。社会总产值1980年仅比1978年增长5.7%，比1979年还少1.13个百分点。国民收入1980年比1978年增

长9.34%，比1979年仅增长2.79个百分点。所以就出现了一年之差。但是，就是八年翻一番，也是我省历史上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这个速度能保持下去，到本世纪末，就可以实现翻两番以上。

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是实实在在地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途径。追求短时期的高速度，弊病很多。大上大下，不仅不能增加更多的社会财富，反而会打乱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造成更多的损失浪费。克服短期行为，既考虑当前的发展，又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必然条件，奠定必要的基础，以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应当作为考核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质量指标。目前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实行了任期制，有的三年，有的五年。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没有一个稳定的中长期计划，而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又过多的强调任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客观上是助长了短期行为。企业搞经营承包，都有好几项承包指标。为了克服承包人的短期行为，把企业的固定资产增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借鉴对企业承包人的考核办法，完善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任期目标，是提高经济工作管理水平，保持经济协调稳定增长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

最近九年，我省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比较快，概括地说是路线正确，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说来，可以从结构上进行分析，也可从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这两个方面去分析。

从社会总产值增加额的构成上看，工业增加的份额（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占45.1%，农业占33.2%，建筑业占9.6%，

运输邮电业占5.5%，商业饮食业占6.6%。如果按城乡两大块划分，农村经济增加的份额占38%，城市经济增加的份额占62%。从国民收入增加额的构成上看，则又是另一种情况：工业增加的份额（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占30.6%，农业增加的份额占51.6%，建筑业增加的份额占5.4%，运输邮电业增加的份额占4.6%，商业饮食业增加的份额占7.8%。由此可以看出，在五大产业中，工业和农业新增加的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占78.3%和82.2%。产值的增加是工业占第一位，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农业占第一位。如果要使产值增加快一些，自然应当多办一些工业；如果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除了提高各行各业的经济效益外，就我省来说，仍须大力加强农业，发展农业。

这九年，我省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再引用一些材料。

——社会总产值的增加额。虽然农村经济这一块只占38%，但是，在工业中，这九年轻工业发展很快，新增加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增加额的44%，而轻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又占80%以上（其中有来自外省的农产原料，我省的农产原料也有一部分是运出省外），如果把这一部份加上，则农业和农村经济直接和间接提供的新增产值的份额占一半以上，新增的国民收入份额占60%以上。

——财政收入这九年增加了2.4倍。众所周知，主要是烟、酒税收猛增。粗略估算，直接和间接来自农村的新增财政收入也在一半以上。

——从社会购买力看。这九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农村购买力的比重已超过城市。在1987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县及县以下的商品零售额占

62.5%，加上农业生产资料的零售额，已占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6%。农村购买力的增加为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和农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商品市场，对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至于农村经济发展快的直接原因则是靠改革，靠党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贵州农村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基本上是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从1958年到1978年，农业总产值仅增长20.5%，年平均增长速度是0.89%。在这21年中，竟有8年是负增长。其中种植业的产值21年只增长7.8%，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0.36%，与同期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2.26%相比，相差6倍之多。这种状况真是难以为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过去往往把它归罪于天老爷不帮忙，或者再找些其他客观原因。根本的问题是人们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搞“一大二公”、穷过渡，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左”的错误，端正了指导思想，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实行了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改革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给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这就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同样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国家并没有增加多少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却使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九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75%，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6.4%，超过前21年五倍多。而且各年之间，即使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保持了逐年增长的态势，没有再出现负增长的年份。主要农产品都是大幅度增长。这九年的粮食总产量年平均达到130.98亿斤，比前21年的年平均产量97.86亿斤，增加33.8%，比较稳定地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烤烟从1978年最高年产

162万担发展到最高年产（1985年）530多万担，增长2.3倍。油菜籽从1978年以前最高年产（1958年）214万担发展到838多万担，增长近3倍。茶叶、水果等增长一倍以上。生猪增长59.6%，大牲畜增长48.4%。这些都是历史上少有的。特别是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在这九年中，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了1.3倍，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6%，高于全省经济增长速度。农副产品率由1978年的29.5%提高到38%。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09.3元增加到341.8元，增加了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户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5.8%下降到占12.4%，事实证明，这九年农村经济之所以发展快，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靠改革。

从投入与产出方面分析，这九年全省经济增长较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投入的增加。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改革促进发展，又依赖于发展，没有生产的发展，改革也会遇到困难。当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改革就没有实际意义，也是不需要的。改革与发展虽有密切的关系，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各有其质的规定性。改革是因，发展是果。改革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排除障碍，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既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又要按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办事。我们知道，在生产力要素中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在人的因素中又还有体力和智力的问题。人们要从事生产活动单有劳动者不行，还要有劳动资料，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要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没有相应的投入就没有产出。各生产要素之间又还有个优化组合问题，不然的话，就不能以等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者说以较少的投入获

得等量的产出。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就要有必要数量的资金。一般说来，经济发展的快慢与资金投入的多少成正比，与资金的利用程度成反比。从我省这九年的情况看，资金的投入也是不少的。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共达204亿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和还多63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累计140多亿元，相当于前26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的总和。粗略估算，生产性投资占60%，每百元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增加60—70元的产值，也该新增80多亿元的产值，占全省新增社会总产值45%左右。如果没有这200余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就不可能有那样较高的增长速度。避而不谈这个重要原因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还应当看到这九年工业生产速度之所以增长较快，与三线建设的投入也有较大的关系。从三线建设开始到1978年，基本建设投资花了近百亿元。在十年动乱时期，有不少的建设项目不配套，未能形成综合生产能力，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已形成的生产能力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些建设项目和生产企业进行了必要的配套建设和技术改造，使这一部份固定资产存量发挥生产效能。这方面投资少，见效快，效益显著，对经济的增长也是起了较大作用。这九年，全省新建投产的重工业项目数不出几个，而重工业产值增长了一倍多，靠的还是三线建设时期建起来的那些骨干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增加了新的生产能力。

(三)

纵向比较我省这九年经济发展较快，横向比较，同全国的平均水平尚有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时间序列上看，我省的经济增长速度，稳定性不如全国。以工农业总产值

为例，全国从1978年到1987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4%，我省同期为9%，比全国低1.4个百分点。全国这九年最高年的增长速度为16.4%，最低年的增长速度为4.2%，与九年平均增长速度比较，波动幅度高低在6%之间。我省最高年的增长速度为19.67%，最低年的增长速度为负0.04%，与九年平均增长速度比较，高过10%，低到负数。

为什么我省经济增长波动的幅度比全国大？从表层上看是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全国农轻重的比例，1978年农业产值占24.8%，轻工业产值占32.5%，重工业产值占42.7%；到1987年，农业产值仍占24.4%，轻工业产值上升到占36%，重工业产值下降到占39.6%。我省1978年农业产值占38.6%，轻工业产值占20.4%，重工业产值占41.0%。1987年农业产值上升到占42.2%，轻工业产值上升到占23%，重工业产值下降到占34.8%。我省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很大，风调雨顺增产，灾害严重减产，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很难保持稳定增长。轻工业中80%左右是以农产品为原料，也受农业丰歉的影响。重工业中机械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又占一半以上，产品面向全国，受全国宏观控制影响很大。全国经济建设扩展时期，我省重工业上升幅度很大，全国紧缩时期，我省下降幅度也很大。1980—1981年我省工农业总产值之所以没有增长，并不是农业和轻工业没有增长，而是因为重工业下降幅度过大，农业和轻工业的增长弥补不了重工业的下降，因此，整个工农业产值没有增长。

近几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农业中多种经营的发展，在工业中轻工业的发展和国防军工企业发展民用产品以及原材料加工工业的发展，才使我省经济增长速度不再大起大落，保持了基本稳定增长的态势。但是，从1985年以来，我省工农业产值增长

速度已落后于全国。原来提出要争取我省经济增长速度略高于全国，实际在这九年中就有六年低于全国，九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也低于全国。

从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看，这九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略高于全国。国民收入，全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8%，我省为9.35%；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25%，我省为9.5%。为什么我省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略低于全国，而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又略高于全国呢？是我们经济效益比全国高，第三产业比全国发展快吗？不是。还是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我们的农业比重大。我们知道，国民收入是各物质生产部门净产值之和，国民生产总值是国民收入加上第三产业中非物质生产部门收入之和。农业净产值一般占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工业净产值一般只占工业总产值30%左右。农业总产值占的比重大，净产值多，工业总产值占的比重大，净产值少，所以就出现总产值与净产值增长速度上的差异。这种情况也反映了我省工业化水平比全国低的实际。

工业总产值有重复计算的因素，以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经济增长速度，弊病较多，不能反映经济效益。国际上一般都是用“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国务院曾经决定从1984年起采用“国民收入”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情况的综合指标之一。十三大报告已将过去使用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改为“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我们也应从上到下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经济增长速度，以便进行同口径比较。

其二，从人均水平方面看，我省与全国的绝对差额在扩大。过去，我省还提出过“爬坡”、“升位”，缩小同全国差距的设想。从这九年的实际看，我省的经济总量指标在全国的位置基本没有多少变化。工农业

总产值，1978年占全国的1.22%，1987年占1.20%。国民收入1978年占全国的1.38%，1987年占全国的1.48%。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和人均国民收入1978年分别占全国的43.75%和49.19%，1987年分别占全国的42.22%和52.22%。即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下降1.53个百分点，人均国民收入上升3.03个百分点。

从绝对数看，无论是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还是人均国民收入，同全国人均水平的差距都拉大了。1978年我省人均工农业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为256元，比全国少329元；到1987年，我省为712元，比全国同期少975元，差数扩大了两倍。人均国民收入，我省1978年为155元，比当时全国少160元，到1987年，我省为443元，比全国同期少405元，差数扩大了1.77倍。如果以1987年为基数，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增长1%，我省则要增长2%以上才能保持增量相等。由此不难看出，我们要缩小同全国的差距，即使平均增长速度略高于全国，也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要赶上全国的人均水平更需要较长的时间。急于求成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把以上分析归纳起来，全文的基本看法如下：

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九年，我省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年平均增长速度均高于三中全会以前的26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八年翻了一番，工农业总产值也接近翻一番，是解放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

2、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原因，一是靠改革，二是靠增加资金投入，二者不可须臾离也。从结构上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3、同全国比较，我省国民收入，国民

加速贵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断想

乔学珩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农村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农村经济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农村情况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反映当前形势最本质的是农村已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进入到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农民已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1987年，我省农民人均出售农副产品的现金收入150.33元，比1980年增长了2.79倍；农民家庭经营得到的现金收入人均207.77元，占家庭收入的比重由1980年的29.5%上升到47.2%；农村出售农副产品的商品率由1980年的27.1%上升到39.6%。与这一根本的变化相适应，我们必须利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和普遍规律。建国以来，长期的产品经济，在农产品购销体制上实行的统购统销，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价格背离价值，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明确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率先从以农村进行体制改革，调动了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要自觉地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按照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后，他们的生产经营行为，更多地依据市场信号的指导来决定生产什么，或不生产什么。近几年，一些农副产品反复出现忽多忽少局面，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农村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未能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产需平衡所造成的。因此，要根据社会对主要农副产品的生产和需求情况，以及不同地区、不同产品的供求关系，灵活运用价格杠杆，在价格上作适当调整，理顺农产品内部的比价关系。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以调动农民生产短缺产品的积极性。但是改革农产品价格问题涉及面大，需要从国民经济全面考虑，逐步实施。

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还必须理顺工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近几年，工农产品“剪刀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影响了农民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从而把生产资金转移到消费方面。目前要下大力解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增长过快的问

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略高于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略低于全国。各年之间的环比指数，我省起伏较大，不如全国平稳。这与我们的产业结构有较大关系。

4、改革开放九年来，我省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但经济总量指标在全国占的份额没有多少变化，人均水平仍然居全国位末。人

均工农业总产值同全国人均水平比较，相对数和绝对数的差距都在扩大；人均国民收入则是相对数的差距略有缩小，绝对数的差距仍在扩大。要想在短时期缩小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难度很大。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研究室)

题，以保护农业生产。国家有关部门，要采取措施，严格控制生产资料的价格和经营，减少中间环节，坚决取缔非法倒卖，从中牟利。与此同时，应当逐步增加农用工业建设的投入，逐步形成支农工业体系，降低支农产品成本，满足农民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真正使农民得到实惠。

(二)

与农业生产由产品经济进入到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必须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逐步建设高产、优质、低耗的效益型农业体系，使之利用有效的农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产品。

长期以来，我省农业资源的配置极不合理，收益很低，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比如，我们每年都用六百多万亩的耕地种植油菜，而仅获取七、八亿斤的产量，全省平均亩产仅一百多斤。而遵义地区不少县平均单产却达到了两三百斤。如果在这里集中种植，只需三四百万亩的耕地，就可以获得现在的油菜任务。这说明由于贵州山区条件差异大，有一些地方无论种植技术，还是土壤和气候等条件都是油菜种植最适宜区，而一些地方则不适合种植。粮食、烤烟、果木等种植也是一样的道理。因此，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出发，必须优化农业资源的配置，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建立区域性商品生产基地。优化农业资源的配置，应注意做好以下几点：

1、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这要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和基本的领导方法。一是要注意充分利用各地资源，扬长避短，合理布局，最大限度的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势，使整个经济发展做到自然适宜、经济合理、各具特点。二是必须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今后的发展做出必要的预测，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打算，使农村经济的发展目标明确，有条不紊，持续稳定。

2、加快产业结构专业化的发展。产业结构向专业化发展，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目前，我省农村经济中，很多产业处于“小而全”的状况，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等，这里既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客观原因，也有我们思想上不重视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主观原因。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专业分工，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次调整好，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深化。调整产业结构，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市场需求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把生产和需求结合起来。这几年买难卖难的现象时有发生，大起大落的波动接连不断。虽然有价格变动的影响，但也有调整产业结构存在盲目性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宏观指导，尽量避免失误。其次，要兼顾为农民增加收入和增加就业机会两个目标。我省还有许多需要发展的产业没有开发，许多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充分利用。要在优化农业资源配置过程中，继续作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第三，发展外延性加工和深加工，充分利用资源，使农产品经过多次加工增值，来缓解初级产品价格过低的矛盾，提高经济效益。

(三)

我省土地利用结构存在很不合理的状况，必须逐步进行调整，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地尽其力。

贵州是山区，25度以上的坡地，本来不适宜种植粮食，可以用来发展（下转第24页）

一、引 论

黔 中 文 化 区 简 论

兼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贵州文化

全建华

1984年7月，省委五届三次会议提出，要认真研究发展战略，要把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密切结合起来，拟订中长期规划初步设想。全省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积极响应省委号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兴起了一股研究省情、省力及其特点和发展战略的热潮。在调查研究中，实行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行多学科、跨部门、多层次的研究，积累了一大批省情资料，出了一大批成果。这些资料和成果，对省、地（州）、市、县和有关部门及单位的领导决策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省情是一个由庞杂的不断变化着的众多相关因素组合而成的规模宏大的系统。兴黔富民的伟大事业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无比壮丽而浩繁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对于省情和发展战略，必须进行全方位的考察研究，不仅要考察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贵州的经济，而且要考察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贵州的政治，还要考察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贵州的文化，才能取得有科学价值的成果。用有科学价值的成果指导兴黔富民的实践，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和深化，随着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大，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历史性进步，我省与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差距尤其是与东南地区省、市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这一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我们深化对省情和发展战略的研究。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而且还要从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等诸方面全方位地去考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强调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7页）全方位地考察研究省情和发展战略，目的就在于进一步探索、认识、掌握并激发蕴藏在全省三千万各族人民中的这种“动因的力量”。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象贵州这样的地处西南的封闭偏远山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能采用西方的“设备——技术——文化心理”这样一种常规模式去进行，而应从国情和省情出发，探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符合贵州实际的现代化模式。本文从文化兼及历史、地理的角度去探讨省情和发展战略，意在力图深化省情的认识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同时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贵州实际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一个新思路。笔者认为，这对兴黔富民的伟大事业是有现实意义的。

二、黔中文化区

（一）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不断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他们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不同、能力不同、效果不同，由此所创造的文化特质也不同。

那么，贵州的自然环境如何呢？

先看地理位置。贵州位于祖国大西南的东南部，西连云南、北邻四川、东接湖南、南界广西，是云贵高原东部一个隆起于四川盆地、湘西山区、广西丘陵之间的斜坡地带，属近海内陆高原山地地区。除社会制度外，地理位置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具有经常的影响，能加速或延缓其发展进程。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前些年来我省讲学时曾强调说，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贵州既定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们：1、远离中华民族的摇篮、开发最早而经济又繁荣的黄河流域，也远离经济自古繁荣的江南地区，从经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说，这对贵州的经济发展很不利。在贵州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体系。2、远离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心，如“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杭州等地，因此极为闭塞。历来奴隶主、封建主王朝和近现代国民政府的政治影响，经过万水千山的阻碍，波及到这里已成为强弩之末。从政治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说，这对贵州的社会进步很不利。贵州特定的社会条件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逐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部族林立、土著首领长期武装割据的政治体系。3、经济繁荣地区、历代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发达地区，贵州远离这些地区，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产水平低，因此从文化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说，对贵州文化发展也极为不利，孕育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经过长期的停滞、缓慢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内向性强、外抗性大、带有浓厚原始色彩而又神秘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不可否认，极为不利的地理位置是造成贵州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不发育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贵州历来被称为尚不开化，“远在要荒”的“蛮夷之地”、“瘴疠之区”。

其次看看贵州的地貌。贵州是名符其实的山国，境内地貌类型复杂，高原和各种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87%，丘陵占10%，盆地占3%。此外，贵州的地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岩溶地貌分布广泛，形态多样。除少数为砂页岩和切割密度较大的侵蚀剥蚀地貌外，70%以上地区为石灰岩等碳酸盐岩发育的岩溶地貌。其个体组合形态如岩溶峰丛山地、岩溶峰丛槽谷、岩溶峰丛洼地、岩溶峰林洼地、岩溶丘陵洼地等分布极广。加之境内河流纵横、山溪密布，因而是一个地面起伏崎岖、河流强烈深切，山高坡陡，闭塞谷地星罗棋布的山国。由于生活的需要，各族人民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开门见山”的闭塞谷地之中，居住在山上，耕作在山上，狩猎在山上，游乐在山上，依靠山而生存，为山而进行各种文化创造，一切文化都带有山的特质，可称之为“山上文化”。

例如，山上辛苦的劳作和狩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活动范围小，而闲暇时间多，文娱生活形式少，而亲族情谊深，逐渐形成山民们好饮酒的习俗。酿酒的原料，无论是包谷、高粱，还是糯米等，无不取之于山。千百年来，贵州各族人民在酿酒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根据当地小气候、土壤、水质等自然条件，酿制出品类繁多，独具风格的美酒，加上形形色色的烤酒工具、饮酒器具，各具特色的生产工艺，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各种有关酒的民间传说以及丰富的酒俗、酒礼、酒歌等，组合而成了独特的包含物质文化、方式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的酒文化丛。

黔中文化区的“山上文化”，植根于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彝族等各族人民生活的沃壤之中，经过千百年来选择、创造、演变、积淀，逐渐形成的，有其悠久的历史。因此，黔中“山上文化”的形成，是其社会、历史、民族、自然环境等各种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除地理位置和地貌之外，再来看看贵州的气候、水资源和生物资源。贵州纬度较低，海拔较高，又处于青藏高原向东部丘陵平原过渡的斜坡面上，地面起伏崎岖，冷暖空气常在此交绥，形成云贵静止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冬暖夏凉，多阴雨，少日照，无霜期长，雨水丰沛，光、热、水年度变化基本同步，气候地域性差异大等特点。总的说来，年均气温在 8°C 至 20°C 之间，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由于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小区气候也极明显，所谓“地无三里平”，“十里不月天”，就是生动的写照。由于雨量充沛，所以水资源也很丰富。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样适宜，无霜期长，水资源丰富，给各种动物植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贵州的动植物资源也极为丰富。考察贵州的气候、水资源和生物资源，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贵州是一个生态环境极好，非常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为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和创造“山上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解放前的贵州经济，是依靠人力与自然资源作简单交换的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自然环境对这种刀耕火种、平面垦植、广种薄收、“赶山吃饭”的低水平的自然经济影响最直接、最明显、也最重要，因而对于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上所创造的某种类型的文化特质也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花了一些篇幅考察贵州自然环境的某些基本特征及其对区域内文化特质形成的深刻影响。这样的自然环境，与产生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的黄河中下游区，与产生吴越文化的江南地区，与产生楚文化的长江中游平原，与产生巴蜀文化的四川盆地等都大不相同。此外，与北方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东北大平原、西北大沙漠、西部青藏大高原以至中南的岭南地区等，也都差异甚大。加上它特殊的社会、历史、民族等各种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逐渐形成其独具特色的黔中文化，有其客观必然性。

（二）独具特色的方式文化

贵州殷周时为鬼方，春秋时为牂牁，属“荆楚”、“荆蛮”或“南蛮”之一部。境内部族林立，存在若干独立割据的政权，为大小不等的国或邑，不属周王朝的职方。建立牂牁国的主体民族是西南古老的土著“濮”人，即今仡佬族的先民。其他还有“三苗”、“峒”、“百越”、“骆越”、“僚”、“西瓯”等，即今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的先民。从殷武丁征伐鬼方，战争规模庞大，时间绵延较久来判断，当时鬼方应有较实在的物质基础，较集中的组织力，一定的兵力，这决不是原始社会中松散的部落形式所能达到的，故可推断中原一带进入奴隶社会之后，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社会也先后进入奴隶社会，初具国家雏型。战国时为夜郎，其余还有且兰、毋敛、漏卧、莫螭、鳖诸国。自秦汉以至明清，虽置郡县，但实质上政令不能达，仍由部族首领及地方大姓世袭统治，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直至解放前，贵州基本上仍处于地方军阀武装割据状态。这就是贵州历史的基本线索和轮廓，考察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掌握贵州独特的方式文化很有帮助。

1、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遗传方式。由部族首领或地方大姓进行世袭的统治，采用自古以来流传的习惯法或按照需要制订的地方法规组织管理社会秩序。没有严密的国家行政机系统，也没有系统的法律体系，统治者的话就是法律，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很浓厚的封

建制、甚至奴隶制色彩。如隋唐时期牂牁谢姓、赵姓、季姓、水西安姓、播州杨姓、思州田姓，宋时的龙、方、张、石、罗诸大姓以及明时的贵州土司、贵阳土司、安顺土司、水西土司、铜仁土司、乌撒土司、镇远土司等大小土司达百余个。“人皆世禄，自用其法”，“鲜知法纪”，“所属土民”，“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流官号令不如头目之传唤也”。人民受着严酷的政治压迫和超经济剥削。而在小范围内，如自然村寨，有的民族，如苗族，有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即长老制度、栽岩议事组织和习惯法，以维护地方古老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宗教祭祀秩序和进行对外联络。长老制度即由寨老、活路头、牯脏头、鬼师傅等“四老”共同管理村寨各种事务的制度。寨老对全寨负有主要责任，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对外联系有决定之权，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四老”都不脱离生产劳动。栽岩议事组织即全寨民主的群众议事会，称“议榔”。如几个寨联合集议，称“合榔”，由各寨寨老参加，推选“榔头”，制订榔规，即共同遵守的某种公约，处理公共案件。这种“议榔”的组织则叫“栽岩”或“埋岩”，“栽岩议事”或“埋岩议事”。过去的“栽岩议事”有四种形式：即一个大寨的栽岩议事，几个临近小寨的联合栽岩议事，几个临近大寨、包括其间小寨的联合栽岩议事，其地区内若干大寨、小寨的联合栽岩议事。前两种栽岩议事，范围较小，具有原始社会部落议会的性质；后两种栽岩议事，范围较大、规模较大，具有部落军事联盟的性质。在栽岩议事中，主持议事者民主公推，议事内容民主协商，议定的公约共同遵守，参加议事成员一律平等。议事前、议事中、议事后都有一定程序，笼罩着原始农村公社议会的气氛。习惯法是“议榔”“栽岩议事”中议定的共同遵守的公约，内容有维护社会秩序、维护集市交易、维护婚姻家庭、维护边界的安全以及对违犯者进行惩处的办法等。其它如侗族有公众推选的“款首”和军事首领。瑶族也有“石碑制度”，全寨议定公约、刻石碑，称为“石碑律”，共同议定共同遵守，推举有声望的老人担任“石碑头”，执行公约。这些现象说明解放前贵州少数民族社会中，封建制、奴隶制、原始公社制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并存。

2、生产方式。也由于上述原因，解放前贵州境内的生产方式呈现出原始公社制社会生产方式、奴隶制社会生产方式、封建制社会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如各村寨还保留族地（公共田地）、族山（公共山林）、墓地和河流地段等。有的地区还保留村寨或一个姓氏共有的小面积土地，收入作为公益开支。有的少数民族在狩猎过程中还保留了“隔山打兽，见者有份”的习俗。这些都是氏族社会的残余形态，财产共有、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再如土司统治下的农民，没有人身自由，没有政治权利，受着严酷的政治压迫和种种超经济剥削，实际上是奴隶或农奴，这是奴隶制残余。在汉族地区或临近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民受到的是封建剥削。在城市工厂中，工人受到的则是资本家的剥削。但从经济形态而言，贵州主要的是依靠人力与自然资源作简单交换的低水平的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生产力非常落后。

3、婚姻习俗。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独立或半独立的地域之中，少数民族中一些古老的习俗一直绵延至今。其中保持了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遗迹的是婚姻习俗。如苗族的“跳月”、“游方”、“摇马郎”，布依族的“抛绣球”、“闹门墙”、“坐表”，侗族的“玩山”、“走寨”，仡佬族的“玩表”，再如苗族的“还娘头”，侗族的“姑舅表婚”，彝族的姑舅表优先议婚，仡佬族的“姑表联姻”，壮族男家有娶外甥女为媳的优先权等。

其他如节日习俗、嫁娶礼节、丧葬习俗、宗教仪式、特殊语言文字、耕作方式等都反映出贵州独特的方式文化。

（三）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

存在决定意识，贵州独特的物质文化和在物质文化基础上所产生的方式文化，经过千百年的选择，一代又一代地扬弃和积淀，逐渐形成了它独特的精神文化。

1、习性、价值标准定势、道德和法律。贵州气候宜人，动植物及水资源丰富，固然给各族人民造就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但是由于生产方式极其落后，山上田间地头的耕作，山林荆棘草莽的狩猎，仍然备尝辛苦艰险。面对洪水猛兽和各种自然灾害，常年爬坡上坎，刀耕火种，奔驰林莽，拼搏狩猎，加之部族之间的仇杀战争，逐渐形成山民们吃苦耐劳之性，强悍刚勇之气。由于聚居的村寨多分布在山间封闭的槽谷或“坝子”之中，人们终生生活在一家一户、一个家族或几个家族的围墙或地界的狭小空间里，疏于与外界发生联系，一生接触的人多限于亲戚，因而逐渐形成人们朴野醇厚寂静恬淡之风，极重亲族情谊交往之情。遇有人客喜庆，关心甚切，有事鼎力相助；凡节令至，过从甚密，互赠酒肉鸡鸭食品，礼物多系自家生产，无需购置。此外，长期受压迫加之贵州多阴雨天气，人们多“阴郁沉静”，性格内向。历史文献中所谓“男无游手，妇勤女工，民风谨厚，守份安贫”；“习俗质野，服用俭约”；“性犷戾，出入不离刀弩”；“性尚刚勇”，“人性犷悍”，“夷人性情强悍，向多仇杀之事”等，有些称谓和提法带有明显的民族偏见，但也可以说明贵州少数民族之勤劳、勇敢、纯朴、俭约、好客、礼貌、互助、守份、不畏艰辛、乐于助人，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热爱劳动，认为好逸恶劳是可耻的；他们勇敢顽强，认为在为公众的利益斗争时胆怯怕死是可耻的；他们纯朴俭约，认为弄虚作假、铺张浪费是可耻的；他们好客礼貌，极重情谊，认为怠慢亲友客人是可耻的；甚至认为即使是不认识的远方人，只要进寨，就是客人，应当以礼相待；他们无私守份，只要不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决不据为己有；认为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公平交换是合理的，而贱买贵卖、经商获利是不道德的；不劳而获、偷盗行窃、巧取豪夺，都是可耻的，应当严惩；为了家庭的生存和公共事务，他们不畏艰难困苦，看到他人、尤其是老人小孩有困难，往往乐于相助，有尊老爱幼的传统。所有这些习性和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已形成一定的道德观念，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风俗习惯中、习惯法乡规民约中可以看到。这些传统，大多是可以经过改造而发扬光大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

2、观念及思维定势，祖先崇拜、神灵崇拜、鬼魂崇拜、自然崇拜以及原始卜巫文化遗迹。贵州各民族的迷信崇拜，是以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为主，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最为突出。例如苗族的祖先崇拜，在他们看来，祖先有无以伦比的伟力，天地是某公创造的，日月又是某公创造的，风雨雷电等诸自然现象和自然物又是某公某公创造的，因此对祖先非常之崇拜礼敬。在他们的观念之中，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不灭，只不过到了另一个世界——“阴间”罢了。若不虔诚祭祀，其灵魂就会回来作祟，或使人生病，或使人困苦等。要想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生活幸福，则必须求助于祖先神力的庇护。故而产生了许多祭祀祖先的活动。在他们的观念中，一切好事，都是祖先神力庇护促成的；而一切坏事，都是祖先的灵魂或其它的“鬼”作祟造成的。这种迷信思想及其所派生出来的种种观念、心理，千百年来使人们长期陷于愚昧，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极大地制约了人们的创造性劳动。与

之相联系的，是鬼魂崇拜，则更为离奇。在他们看来，人之生老病死，社会之风云变幻，大自然之千差万别，各种事情之成功失败，无一不是鬼魂作祟的结果。真可谓鬼魂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此，无论好鬼恶鬼，其种类难以计算。封闭的地理环境，封闭的社会生活，低水平的自然经济，低水平的生活方式，面对丰富的资源而只能作极为有限的开发利用，以辛勤的耕作和艰险的狩猎所换取的是极不稳定的温饱，加之历代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剥削和对祖先、神灵、鬼魂、自然的崇拜礼敬以及通过各种形式的神判、卜卦来判断是非曲直等，这就形成其独特的观念定势、思维定势。对祖先、神灵、鬼魂、自然的崇拜礼敬及其祭祀程序，各种形式的神判、卜卦的程序等，非常明显地带有原始卜巫文化的遗迹。总之，一切归于神灵，漠视人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劳动，漠视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漠视外界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方式、新科学技术，迷信、愚昧、落后、保守，这是“黔中”“山上文化”的“精神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对整个社会生活影响极大，不可忽视。

其他，从各民族古老的民间传说、民歌、音乐、美术、舞蹈、工艺品、酒歌、古歌、情歌等，也都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反映出独特的精神文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黔中地区无论在物质文化、方式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都有其类似的特质，可以视作区别于其他文化区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区。解放前，黔中地区文化的基本特点，简言之是：①物质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山上文化”的特质；②在“山上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方式文化，许多方面带有封建制、奴隶制和原始公社制社会诸方式文化因素组合的色彩，但以封建制社会方式文化的因素为主；③在上述物质文化和方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文化，许多方面带有封建制、奴隶制和原始公社制社会诸精神文化因素组合的色彩，原始公社制社会精神文化因素的色彩较为浓厚。至解放前，黔中地区文化属于封闭的亚热带大陆高原山地上滋生起来的以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为生存基本手段的宗法社会。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黔中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党的十三大特别强调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总结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三十多年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科学论断。贵州在全国，是经济文化都较落后的地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在研究省情和发展战略的时候，尤其应当注意到这个社会现实。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黔中文化的特点

1、物质文化方面：

①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用1984年和解放前的1949年比较（下同），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从11.2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上升到134.93亿元，增长8.4倍。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73.35亿元，增长48.5倍，农业总产值达到61.58亿元，增长2.3倍。35年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91.71亿元。在农业方面，兴修各类水库2.8万座，总库容达20亿立方米，农田灌溉面积从285万亩增加到622.5万亩；兴建小水电站4,600多座，装机容量40多万千瓦；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71.11万千瓦。在工业方面，工业企业从200多个发展到8,602

个,固定资产原值达到117亿元。在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黔桂、川黔、贵昆、湘黔四条铁路干线和一些支线,铁路通车里程达到1467.7公里;公路通车里程由1900多公里发展到27,872公里;其它如内河航运、民用航空运输、邮电通信及建筑业、商业服务业、城镇建设等,也都有了较大发展。

②贵阳、遵义、安顺、都匀、凯里、六盘水等市已建成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其它各县也有了一批县级工业企业;广大农村出现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和集体、个人企业。

③贵阳、遵义、安顺等市周围农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村具备了一定水平的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

④其余广大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缓慢,仍以平面垦植、依靠人力与自然资源作简单交换的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为基本生存手段,低水平的“山上文化”的特点相当突出。

2、方式文化方面:

①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遗传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由部族首领、地方大姓、地方军阀、反动政府官僚共同组成的奴隶制残余、封建制和官僚资本的反动统治和社会遗传方式,已经彻底推翻,代之以人民民主专政。原有的带有原始社会遗迹的长老制度、裁岩议事制度,石碑制度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自行消亡。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了统一的法律,以代表人民的利益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而习惯法中的合理的成份则作为法律的补充。

②随着旧社会被推翻,奴隶制社会生产方式、封建制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都被清除,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在农村则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农村,特别是“少、边、穷”地区,仍以自给或半自给的自然经济为基本的生存手段。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农村中出现了一大批专业户、个体户、联合体,这是当代贵州农村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双层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工业生产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商品经济至今仍不发达,在全国处于明显的落后地位。

③生活方式方面。就农村而言,消费生活领域中的需要与水平的停滞性,生产消费一体化和消费的自给半自给性,结构的超稳定性和模式的固定性,平均化欲望和克俭性;精神生活领域中的保守性和散漫性,以及求稳怕变,守旧知足的心态;社区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人口居住分散,日常生活结构简单,内容贫乏,人口流动的静止性和人际交往的封闭状态,人与人关系直接密切,人伦情感和传统习俗浓厚,生活模式的社会文明度低,闲暇生活领域中,活动方式也相当低级简单;家族生活领域中,婚恋、嫁娶、生育、丧葬习俗以及节日祭祀、宗教仪式等都带有原始公社制后期的许多遗迹,传统习俗浓厚。

3、精神文化方面:

①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国家输入了大量的资金、科学技术和科研教学设备、各类专业人才以及现代化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新理论、新信息等,黔中地区的教育、科学、文艺、体育、卫生等方面的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发展很不平衡。先进的精神文化的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在贵阳、遵义、安顺、都匀、凯里、六盘水几个城市;以此扩散到各县城

镇，其能量大大减弱，已显得落后；至于扩散的农村、尤其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穷困地区，几乎被原有的精神文明所抵消。

②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在道德观念、法制观念方面效果较为显著，尤其是广大农村。究其原因，是社会主义的道德、法制观念与千百年来农村中尚存的原始公社制的某些观念有某种相似之处，易于为广大农民所接受。由于市场不发育，商品经济尚待确立，在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广大农村尤其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穷困地区的农民尚未树立商品经济观念和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观念。

③原始宗教的一系列观念，如祖先崇拜、神灵崇拜、鬼魂崇拜、自然崇拜及神判、卜卦等观念，至今仍顽固地禁锢着落后贫困地区农民的思想，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定势、思维定势和价值标准定势，使之长期陷于封闭迷信、愚昧、保守。

总之，当代贵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现代化大生产与传统的原始农业的小生产并存；设备精良、具有一定综合配套能力的航天、电子、航空等尖端科学技术与大量文盲、半文盲并存；“墙内上天入地”与“墙外刀耕火种”并存；精密仪器仪表与结绳刻木记事、数豆子记帐并存；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通过五洲四海的贸易与乡场的物物交换并存；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与经济落后、停滞、生态恶化几乎陷于绝境的偏僻山乡并存；较之过去显得可观的经济总量与少得可怜的人均量并存；人民生活的小康、温饱与贫困并存；飞机、火车、汽车与人力车、马帮、背兜并存；电报、电话、电传、电视与吃串串肉方式传达习惯法内容并存；电视、剧场的现代艺术与农村古老的雄、傩戏、地戏并存；现代流行歌曲与流传千百年的古歌、民歌并存；作为经济成份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与种种非公有制经济并存；按劳分配与非按劳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人治与法治并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形形色色的非社会主义思想并存；现代科学与原始宗教迷信并存……呈现出多种类型、多种层次并存的现象。用发展观看当今贵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我们的着眼点应放在其不足之处。按照这样的思路看贵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的特点，笔者认为，概括言之是：封闭的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为基本生存手段的低水平的“山上文化”，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生活方式水平低；传统习俗浓厚，原始宗教迷信观念盛行，愚昧、落后、保守的观念定势、思维定势和价值标准定势结构的超稳定和模式的固定性，使之内向性强，外抗性大，外部文化输入的影响如果小于其内向性和外抗性，则很快抵消；缺乏积极进取、主动创新的生机和活力，缺乏主动改变环境、创造新的生活的自觉意识。通过上述分析和概括，显而易见，我们通常所说的“贵州文化落后”，实质上是指其精神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心理积淀”部分的封闭性、落后、愚昧和保守性。著名的智利学者萨拉孔·班迪博士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说：“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真可谓一语中的！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黔中文化与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贵州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巨大的变革，不仅对贵州，而且对全国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到黔中文化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之间的激烈